

朱绍侯 主编



官 吏 傳

昏·君·传

朱绍侯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395

昏 君 传

(上、下)

主 编 朱绍侯

责任编辑 笑 峰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印张591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350册

ISBN7—215—00294—2/K·83

(上、下) 定价 9.40元

上 集

序 言

• 朱绍侯 •

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进行历史发展规律教育的最好教材。解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历史书、人物传记一类的书，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一般历史书多注意正面教育，写人物传记多写正面人物。河南人民出版社匠心独运，企图从反面认识历史，从反面历史人物方面总结历史教训，了解反面人物是怎样给国家、给民族带来了危害，怎样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不仅有正常的发展，而且也有阻力和破坏，为了保证历史不断而迅速地向前发展，就要学会与阻碍、破坏历史发展的势力作斗争。

在中国四千年的文明史中，历代的君主（国主、皇帝）无疑是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人物。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和后世，当然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禹、汤、文、武那样的“圣王”，也不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英君”。那些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作出杰出贡献的“圣王”、“英君”，当然值得后人永远传颂，但是，在中国文明史上，也不乏夏桀、商纣、周幽王、陈后主那样昏暴荒淫的君主，他们的倒行逆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危害，是永远洗涮不

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千古的罪人。

对于顺应历史发展的人物，我们称之为进步人物、正面人物；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我们称之为反动人物、反面人物。对于进步人物、正面人物的功绩，当然应该歌颂，使之发扬光大，成为革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的动力；然而，对于反动人物、反面人物的事迹，也不该完全埋没。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正视反面人物的作用。从历史的借鉴意义上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反面人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反动。反面人物可以提供历史教训，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使历史少走弯路。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才同意接受主编这部《昏君传》的任务。

(一)

所谓“昏君”，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指象阿斗那样没有政治头脑或象晋惠帝那样痴呆作傻的君王，更主要的是指那些违背事物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障碍的反动君王；指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背叛民族利益，给民族带来严重创伤的失节君王；指那些刚愎自用、凶暴残忍、以个人意志压制全社会意志的残暴君王；指那些玩物丧志、一味发展个人兴趣、委政于佞臣，给社会带来严重动乱的无志君王；指那些荒淫宫廷、毁坏朝纲、怠慢朝政的糜烂君王……总之，凡是站在历史反面，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的君王，都在昏君之列。

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要求，一意孤行地按个人意志行事，是历史上昏君的重要方面。如西周时期的周厉王，其执政时期，

奴隶制的母体内部已经逐渐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井田制开始遭到破坏，私田正在不断出现，山林薮泽正被私人开发，土地国有制的缺口已被打开。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周厉王认识不到这一点，执政以后，听任大臣荣夷公的唆使，实行“专利”政策，宣布山林河湖的各种产品归国家独有。这种政策与正在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是正相抵触的，实行的结果是“所怒甚多”，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国人的反对面前，厉王并没有清醒，反而把国人对他的批评说成是“谎言”，一经指控，滥行杀戮，结果使矛盾更为激化，最终导致了反对厉王专利独裁的武装暴动，葬送了周厉王的统治。再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不顾自己国力弱小的客观事实，一意争当霸主，连年发动战争，在争霸战争中，又背离战争规律。在宋、楚两国“泓水之战”中，楚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军，在这种情势下，臣下公子目夷提出趁楚军渡河时发动进攻，扼敌军于困境之中以取胜。这本来是以少胜多的上策，是战争的客观需要，而宋襄公此时却振振有辞，说什么“‘仁义’之师不乘别人之危”，拒绝出兵，贻误了战机。待至楚军渡过泓水来至阵前，情势十分危急之际，目夷又提出乘楚军未排好军阵之前，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是战争取胜的最后希望。可是，宋襄公仍执迷不悟，不肯出兵，再次贻误了战机。战争以宋军惨败、宋襄公负伤而结束。事已至此，宋襄公仍不肯认错，侈谈什么“君子作战，不杀受伤的士兵、不俘虏上了年龄的士兵、不乘别人之危取胜。”自以为自己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道义”上取胜了。不久，宋襄公伤情发作，霸业未成身先死，宋襄公的“仁义之师”也随之成为历史上的笑柄。

为个人小朝廷，丧失民族气节，背叛民族利益，在中国历史

上的昏君中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如五代时期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本是后唐一员大将，为了发展个人势力，建立石家天下，竟不顾廉耻，先是向契丹称臣纳贡，后又称子，如此还不算，还以契丹“父王”立石敬瑭为“儿皇帝”为条件，将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的幽、蓟、瀛、莫、涿等十六州大片土地割让给契丹。石敬瑭坐上了后晋高祖的皇座之后，始终不渝地坚持“卑辞厚礼以奉契丹”的治国方略，竭力维护与契丹的“父子”关系，依仗这种关系，石敬瑭的皇位算是坐稳了，而他统治下的人民却为此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契丹军队以“父皇帝”兵自恃，经常涉足中原，肆意搜刮财富。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国度，如何能够长久？自然是生存不了几年。再如北宋徽宗，面对北方金人的咄咄逼势，不去积极组织力量抵抗，而是临危卸职，把帝位让给太子，自己却躲进宫中。当传来金兵渡过黄河的消息后，徽宗父子不以国家为重，各自打着个人的算盘，徽宗连夜逃离开封抵达扬州，后又逃到镇江，以“太上皇”的名义把持住东南半壁江山，准备与太子宋钦宗分庭抗礼，继续做他的皇帝梦；钦宗则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拱手割让给金朝，以出卖民族利益为手段妄图保住自己的统治。当金人包围开封时，钦宗竟传旨军民放下武器、撤下城防，使金兵轻而易举攻占了开封，中原人民生灵涂炭，徽、钦二宗也被俘他乡。

由于剥削阶级的属性所使，凶暴残忍、刚愎自用、以个人意志压制全社会意志的残暴君王，在昏君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夏桀、商纣、胡亥、石虎、杨广等，是众人皆知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们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是相当沉重的，几乎都是亡国的悲剧。如商朝末代君王商纣王，是天下暴君之首，对那些“犯上”的民人，他搞了一个“炮烙之刑”，即在铜柱上面涂上

油脂、铜柱下面燃起炭火，让“罪人”光脚走在滚烫的铜柱上面，直至掉入炭火中烧死；对那些有不从之意的方国首领，则大加刑戮，其时有一九侯之女被纣王看中，九侯之女不从，纣王杀掉该女不算，又迁怒其父，把九侯砍成肉酱，名曰“醢刑”；知其情故的鄂侯为九侯申辩了几句，结果被钉在木架上，将其肉一片片割下，晒成肉干，名曰“脯刑”。面对纣王的淫威，纣王的叔父比干直言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以观“圣人心窍”为名，将比干大卸八块。纣王的残暴引起了周边各族人民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忿怨，在其后周人灭商的过程中，商人阵前倒戈，商纣王自焚而死，商王朝也随着商纣王的淫威成为历史的陈迹。再如隋炀帝杨广，就其政绩来讲，不可不谓是雄才大略，但是，他身上隐藏的致命点就是毫无节制的残暴。炀帝登基本身就带着浓郁的血腥味，他是沾着父亲兄弟的鲜血登上皇帝宝座的。登基之后，其残酷的一面更是暴露无余，他大肆构筑军事设施，无休止地修筑驰道，开挖运河，广建宫室园囿。修边防长堑用丁十万，补修长城用丁二十余万，修建驰道用丁百余万，营修洛阳用丁二百万，开挖通济渠用丁百余万、永济渠用丁百余万，……五年之中征发丁男不止千万，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四千六百万。在这个暴君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就役，男女老幼奔劳，营东都洛阳，死人十之四五；修长城死人十之五六；开通济渠，死人三分之二，人民的白骨垒砌了城墙，人民的鲜血淌通了运河！这并没有满足炀帝的胃口，他要做绝代君王，要征服这个世界。他频频向外用兵，征林邑，士兵肿足而死者十之四五；征流求，用军万余，馁疾死者十之八九；征吐谷浑，兵卒冻死过半；三次征高丽，用兵数百万，丧亡大半。暴君的野心，给民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人民到了无心生存的地步，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王朝的统

治，炀帝自己也被一条绫缎结束了他残暴的一生。

在昏君当中，还有一类只顾发展个人兴趣，玩物丧志，这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殆政行为，在许多时候同样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动乱。如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主李煜自幼喜欢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填词，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给自己取了许多别号，“钟隐”、“钟山隐士”、“钟山隐者”、“莲峰居士”等等，以表白自己没有当政的欲望。但历史的机遇，还是由他接替了南唐的帝位。当政以后，北宋灭唐已在明暗之中，值此危难之秋，后主李煜本来应该振作精神，把精力投放在治国上面，可他置国难于不顾，依旧沉湎在诗词歌舞之中。诚然，这样做的结果，使他在填词方面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无论从语言上、情感上、题材上都超越了前代，并成为宋代词作发展的先导，但正如宋太祖对他评论的那样，李煜只算得上是一个好的翰林学士，却谈不上是一个好的君王。在个人兴趣得到实现的同时，南唐政治却是一片昏暗，在宋军兵临金陵城下之时，后主李煜仍在宫中取乐，直到被俘出降，方知已经成了阶下囚，后悔已经晚了，在被押的战船上，回首金陵，一腔悲痛，吟出了“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的悲歌。在囚禁当中，他又写了一首《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南唐灭亡了，后主只有终日以泪洗面。

荒淫误政，可以说是历代昏君的共同之点，周幽王、汉成帝、陈后主、元顺帝、明武宗之流，可谓是荒淫君王中的首魁。周幽王的例子更为突出，他为了引得宠妃褒姒一笑，竟然在无敌

进犯的情况下，命士兵点燃告警烽火，集各路军马至骊山下，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周王朝时期，幽王开如此大的玩笑，自然使宠妃发出了笑声。这一笑，喜煞了幽王，可也笑掉了军心，笑垮了西周王朝。在不久的时候，当周边戎狄来犯，再点烽火之时，抗敌的兵马却没了影踪，镐京轻易被践踏成平地。

不思振作，甘为人臣，是许多末代君王昏聩的主要表现。如蜀汉后主刘禅，当政之时，不思进取，整日深居宫闱之中，一但魏军压境，不是计议抵抗，而是在投降与逃亡中抉择道路。降魏以后，并无悲凄心情，深居洛阳城内，居然还有了一个安乐县公的封号，在一次与司马昭共宴时，司马昭问后主：“颇思蜀否？”他竟爽快地回答：“此间乐，不思蜀。”其昏聩无能到了如此地步！

(二)

这部《昏君传》所记述的五十多名反面君主，可以说是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统治阶级中腐朽力量的集中体现者。人们不禁会问：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腐朽、反动的君主？应该说反动君主倒不是中国的特产，世界各国都有，就中国而论，产生这么多反动君主既有客观的必然因素，也有些是属于某些人的主观因素。

就客观的必然因素来说，首先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君主世袭制的必然恶果。一般来说，不论是哪朝哪代，它的开国君主，一般都是有创业精神和才干的，接下去的君主，则是由世袭制度决定的。只要是君主的嫡长子，就是君位的当然继承人，即使这

个嫡长子是个白痴，也要继承君位。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他在当太子时，大臣们就知道他不堪政事，而晋武帝司马炎也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司马衷是晋武帝的嫡长子，他终于当上了皇帝。试想把治理国家的大事，交给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白痴来掌管，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西晋末年的政治腐败黑暗，八王之乱一发而不可制止，与白痴皇帝司马衷不能说没有必然联系。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世袭的皇帝不是白痴，也不一定是皇帝的嫡长子，而是其他皇子皇孙，同样也会产生昏君。因为皇帝的子孙，都是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后妃之手，他们生下来就要封王封侯，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过着极侈的生活，不知其先祖创业之艰难；他们周围的人，不是女就是宦官，阿谀奉承是他们的本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皇室贵族、龙子龙孙，一旦当上皇帝，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满足自己无止境的骄奢淫佚生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这就是说，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君主世袭制度是产生各种各样昏君的温床，要铲除这一类的昏君，就要铲除奴隶制、封建制的君主世袭制。

我们说君主世袭制是产生历代昏君的客观因素，并不是说世袭的君主一定就是昏君。从历史上看，开国皇帝身后的继承人，有不少是能够继承祖业，励精图治，把国家推向盛世的。这中间就有一个个人因素的问题。

在君主世袭制下，皇帝是“天子”，是权力的终极，中央集权政治使得帝王失去了任何制约力。一个帝王是“圣主”还是“昏君”，是和这个帝王个人的能力、品行、好恶紧密相连的。帝王的意志是靠手下的臣僚贯彻的，反过来，围聚在帝王身边的臣僚也影响着帝王的意志。一个英明的帝王，总是能够从国家利益出

发，起用一些贤能之士，而一个昏庸的帝王，往往从个人恩怨出发，排斥忠良，起用一些阿谀逢迎之辈。这些奸佞小人一但得势，往往会依靠媚主谀君的本领左右当朝帝王。他们为了巩固受宠的地位，又会千方百计陷害忠良，至使朝廷无忠臣，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从而左右帝王的意志，使得当朝帝王沿着暴虐昏庸的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即使历史上很有成就的帝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他们锐意图治的时候，能够以历史上失败的帝王为镜子，在用人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周围臣僚十分警惕；而当他们志骄意满，不求进取的时候，便忘却了“逆耳忠言”的古训，听任起奸贼佞臣的摆布来。

历史上许多昏君，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昏庸之辈，有的人在中青年时代还是比较有作为的，如隋炀帝杨广，在当皇帝前，曾经是一个谦恭好学、礼贤下士、颇孚众望的人物，特别是辅佐其父杨坚（隋文帝）平陈统一南方，成为名噪一时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杨广在当了皇帝之后，志骄意满，他的残暴荒淫的腐朽一面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再如风流皇帝唐玄宗，在其执政前期励精图治，曾经出现过“开元盛世”，把唐朝的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但是，到了中期以后，唐玄宗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信任奸佞，迫害忠良，才出现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还有一些昏君，如果他们不是作为皇帝来评价，在某一方面倒不失为天才，如宋徽宗的书画、李后主的诗词，都有独到的成就，不能不说这是对祖国文化的巨大贡献，然而作为皇帝，他们确实是误国误民的昏庸之辈。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所谓个人因素，归根结蒂还是与制度有关，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专制君主制度，就是产生这些昏君的土壤。不过，历史也是无情的，尽管专制君主有无上权威，当他们倒行逆施，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可挽救的恶

果时，他们也必然为历史所抛弃。

(三)

在我们组织编写这部《昏君传》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由于时代、环境、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写出了历代昏君的不同的历史轨迹，以防止“千人一面”模式化的倾向，同时也注意到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为了使读者对书中人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即使是最荒淫残暴的昏君，只要他们做过一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也给予应有的肯定。如杨广以荒淫暴虐著称，但他经营大运河，打通南北水路交通，在客观上是造福于后代的壮举，书中对此作了适度的评价；对唐玄宗在前期的作为，也作了充分肯定；对宋徽宗和李后主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也本此精神作了处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对昏君的本质分析，帮助读者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尽管历代昏君，其荒淫残暴、昏庸狡诈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深陷于个人欲望的沟壑中是相同的，他们的历史归宿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部《昏君传》集中写了这么多的反面君王，就是为后人提供一部反面教材，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为了编好这部《昏君传》，我们组织了一批对书中人物比较熟悉的研究者承担写作任务。因此书中所编选的昏君传，基本都做到了广泛占有资料，认真进行研究，以期深入浅出，使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统一起来，呈现出个性鲜明，五彩缤纷，文风潇洒，简练通顺，引人入胜，令人深思，雅俗共赏。大多数篇章，不失为佳作。

这部书由于是集体写作，在文笔和风格方面当然会各具特色，但是，既然这是一部统编的书，就要求本书有一个统一的体例和文风，为此在编审过程中做了一些调整和加工，并为每传加了一个表明其特色的标题。然而，在编过之后，回头检查一下，全书各传的文风、体例仍有不够协调之处。不过，考虑到本书各传都是独立成章，前后并无相因的衔接关系，强求一致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相反，保持原文的独特风貌，或许更能引人入胜。

另外，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孙英民同志为本书的编写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参与了编撰工作的全过程，没有他的积极工作，我是难以在繁忙的工作中将这部书编成的。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不论是作者还是编者，在主观上都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书中人物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分析，力求做到公正的评价，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雏飞书屋

目 录

暴虐无道的夏桀.....	(1)
贪婪残暴的商纣王.....	(8)
怠政极欲的周幽王.....	(16)
利令智昏的周厉王.....	(26)
乱伦丧生的齐襄公.....	(33)
不审时势的宋襄公.....	(39)
凶残昏聩的晋灵公.....	(47)
荒淫无耻的陈灵公.....	(58)
倒行逆施的鲁昭公.....	(63)
丧心病狂的楚灵王.....	(71)
妄自尊大的吴王夫差.....	(79)
昏庸无能的楚怀王.....	(98)
暴虐天下的秦二世.....	(111)
荒淫昏庸的汉成帝.....	(129)
营私误国的汉哀帝.....	(144)
奸诈虚伪的王莽.....	(160)
君道秕僻汉桓帝.....	(184)
大厦倾覆罪汉灵.....	(201)
弃国就辱的汉后主.....	(224)
暴顽凶逆的吴末帝.....	(235)
白痴迂腐的晋惠帝.....	(259)
政苛刑酷的石虎.....	(280)
狂悖暴虐的宋后废帝.....	(295)

- 荒诞残暴的齐东昏侯 (309)
兴衰集于一身的梁武帝 (326)
残忍多忌的梁元帝 (341)
“无愁天子”北齐后主 (357)
奢淫荒唐的北周宣帝 (369)
嗜酒怠政的陈后主 (382)